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八十六本，第四分
出版日期：民國一〇四年十二月

從朱震亨到丹溪學派——元明儒醫和醫學學派的社會史考察

張學謙*

元代醫者朱震亨 (1281-1358) 及其身後之丹溪學派是明清直至當代醫史編纂論述的重心之一。本文立足社會史的視角，利用地方志、族譜、文人贈序等多種史料，細緻地重構了朱震亨從一個在地方社會擁有俠、儒、醫多面形象的士人上升為明清後世儒醫偶像和丹溪學派始祖的歷史過程。本文第一節致力於重現朱震亨在地方社會的形象與角色，其人早年尚俠，後在婺州濃厚的理學傳統熏陶下轉向「求道」之路：一方面研究「小道」醫學，另一方面積極組織當地「朱氏宗族」的祖先祭祀活動。第二節考察了元末明初號稱為丹溪傳人的醫者群體。雖然此群體並無一致的醫學理念，但醫者們以授受醫學知識建立縱向師徒關係，同時亦有同鄉、姻親的橫向聯繫，最重要的是共同尊奉丹溪為醫學之師。自十四至十五世紀中期，此醫者群體的活動軌跡從婺州擴展至江南地域的中心蘇州以至新建明王朝的太醫院，構成了朱震亨從一介地方醫者躍居明清儒醫偶像的社會基礎。第三節探討儒醫朱震亨形象最終的確立與丹溪學派的形成。本文發現，十五世紀中期以後，原本以師徒關係維繫之醫者網絡逐漸模糊，以釐清「真正」的丹溪知識及金元醫學知識系譜為目的之文本撰寫與出版取而代之成為比附朱震亨最主要的方式，形成了後世所認定之學派面貌。經由商業書坊的營銷出版，這些比附丹溪的文本廣泛流傳，並以聲稱認同同一文本理念的「學派」風格深刻影響了明清醫學知識的生產與實踐。

關鍵詞：社會史 丹溪學派 儒醫 文本知識

* 香港大學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

十一至十三世紀是中國醫學史上的一個重要轉變時期。劉完素（約 1132-1208）、張從正（約 1159-1232）、李杲 (1180-1251)、朱震亨 (1281-1358) 這四位醫者以「金元四大家」的讚譽進入歷史書寫。在一個戰爭頻仍、政治動盪、疾疫流行的年代，這四位醫者所提出的醫學主張，不斷地被以後的醫者推崇，尤見於醫學文本的撰寫。清《四庫全書》編纂者視此時為醫學界產生學派派別的關鍵時刻：「儒之門戶分於宋，醫之門戶分於金元。觀元好問〈傷寒會要序〉，知河間之學與易水之學爭。觀戴良作〈朱震亨傳〉，知丹溪之學與宣和局方之學爭也」。[1] 此觀點影響了許多現代的醫學歷史研究者。[2]

朱震亨，字彥修，號丹溪，浙江婺州義烏（今金華義烏市）人，是「金元四大家」中唯一生活在長江以南的醫學大師。一般認為他將金元時期北方的醫學創新，靈活地運用到元帝國「南人」身體之上。[3] 作為宋以後最重要的「儒醫」和「丹溪學派」創始者，朱震亨曾被學界廣泛關注，相關研究汗牛充棟。其中重要的研究包括：費俠莉 (Charlotte Furth) 從分析「儒醫」多重面貌的角度，提出朱震亨既是醫者又是哲學家：他將醫學視為「格物」的手段，為醫學尋求「道學」體系中的位置，同時將朱熹理學中的基本觀念滲透至身體經驗實踐中。[4] 吳以義從醫學知識傳授網絡的角度，考察了劉完素至朱震亨的醫學傳承體系，認為劉完素及其門人「亦師亦友」，而丹溪師徒關係則變得謹然有序。[5] 梁其姿認為，朱震亨的個案典型地反映了醫學師徒關係的變化：金錢進入師徒關係，師徒產生密切的思想情感關聯，徒弟被期望表現對老師思想的忠誠，越來越像儒學內部的師徒

---

[1] 永瑢等著，紀昀總纂，《欽定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藝文印書館，1964），卷一〇三，頁 1998。

[2]「金元四大家」的論述在明清以至現代中醫史上依然盛行。請參考范行準，《中國醫學史略》（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1986），頁 164-192；李聰甫、劉炳凡編，《金元四大醫家學術思想之研究》（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3）；丁光迪，《金元醫學評析》（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9）。

[3] 吳以義，〈溪河溯源：醫學知識在劉完素、朱震亨門人間的傳遞〉，《新史學》3.4 (1992)：57-94；關於元明之間醫學中「南北」身體體質的分析，請參考 Marta Hanson, *Speaking of Epidemics in Chinese Medicine: Disease and the Geographic Imagin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pp. 49-68.

[4] Charlotte Furth, “The Physician as Philosopher of the Way: Zhu Zhenheng (1282-1358),”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6.2 (2006): 423-459.

[5] 吳以義，〈溪河溯源〉，頁 57-94。

關係。[6] Fabien Simonis 從探究「癲狂」病史的角度，指出明代丹溪學派一致地將「癲狂」歸咎於「痰」的病因，而且，此一致性是透過文本群之間的「互文」(intertexuality) 以及「丹溪文庫」(Danxi corpus) 的生產表現出來的。[7] 總之，朱震亨的個人歷史一再地被學界用作研究宋元明清醫學思想系譜和醫學組織方式的個案，但卻未有將其置於元末明初婺州之特定時空背景中的詳細研究。所以，在上述學界對朱震亨思想背景和系譜的全面分析的基礎之上，本文擬從社會史的角度來審視朱震亨。

然而，本文從社會史角度解讀朱震亨和丹溪學派，絕非試圖否認朱震亨的思想原創性或是丹溪學派對醫學知識的貢獻；而是傾向從學界關於宋以後「儒醫」和「學派」的總體研究動向中，重新檢視作為「儒醫」表率之一的朱震亨。[8] 無論「儒醫」、「學派」抑或學派思想，都不是一個絕對的歷史實體。雖然「儒醫」以模仿儒學建立道統的方式來書寫醫史，但在社會中，「儒醫」更多地是一種比附「儒」的社會聲望標籤，而非一個有清晰疆界的社會階層。[9] 並且，作為一群宣稱擁有共同原則和理念的醫者群體，不同學派之間並沒有堅實的疆界，學派內部的傳承網絡關係亦以比附居多。[10] 所謂學派的思想原則也不固定，譬如清代江南「溫病學派」的「溫病」，在二千年歷史文本中的含義多變，是一個隨著醫學理論和社會發展不斷變化的疾病觀念。[11] 在這樣的視界中，本文並非假定朱震亨是元末明初最傑出的醫者；同時代江南有許多可以和朱震亨相媲美的名醫，譬如在學統上和朱震亨十分接近的蘇州醫者葛應雷 (1263-1323)、儀真滑壽 (fl.

---

[6] 梁其姿，〈宋代至明代的醫學〉，氏著，《面對疾病：傳統中國社會的醫療觀念與組織》（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頁 3-28。

[7] 明代出現一批依托丹溪之名的文本，採取折衷的策略合成了包括朱震亨在內許多宋金元醫家的文字，這些文本的形成和散佈標誌了具有系統知識的丹溪學派的形成。參考 Fabien Simonis, “Mad Acts, Mad Speech, and Mad People in Late Imperial Chinese Law and Medicine” (PhD diss., Princeton University, 2010), pp. 136-201.

[8] 有關宋儒醫的探討，參考陳元朋，《兩宋的「尚醫士人」與「儒醫」——兼論其在金元的流變》（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97）。

[9] 祝平一，〈宋明之際的醫史與儒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7.3 (2006)：401-443。

[10] Volker Scheid, *Currents of Tradition in Chinese Medicine: 1626-2006* (Seattle: Eastland Press, 2007), pp. 11-13.

[11] Marta Hanson 批評了很多史學家將「溫病」看作是歷史實體的作法，並且指出從漢至清，文本中「溫病」之間的關係也不是理所當然的祖先與子孫的族譜關係，Hanson, *Speaking of Epidemics in Chinese Medicine*, pp. 19-22.

1360-1370)，他們同樣吸收北方醫學知識的長處，葛應雷甚至曾任江浙醫學提舉。[12] 又如在理學史上留名的江西醫者李存 (1281-1354)，習醫的同時也在理學系譜《宋元學案》佔有一席之地。[13] 但是這些醫者都沒有成為任何學派的始祖，也沒有被當作醫學史中的「儒醫」表率。總而言之，本文的研究取徑是利用地方志、族譜和文人贈序，試圖從社會環境中呈現多面向的朱震亨及其相關醫者網絡，並意圖從十五世紀中期以後文本的編纂出版分析丹溪學派的形成。

相較同時代其他醫者，朱震亨的史料非常多，比如冠以「丹溪」名義的醫學文本，明代出版了近二十種，重刊本更是不計其數。[14] 墓誌及傳記是研究朱震亨生平的重要史料，其撰著者非常有名：石表辭由婺州文人領袖、《明史》編修總裁宋濂 (1310-1381) 撰寫；[15] 傳記由另一婺州文人領袖戴良 (1317-1383) 所作。[16] 二人對朱震亨生平的記述側重點不同，戴良專注於朱震亨「錄其醫之可傳者」，而宋濂所撰墓誌則介紹朱震亨「講學行事之大方」。[17] 然而他們的撰述無一例外地強調朱震亨是「儒醫」典範。尤其宋濂以強烈的理學正統意識在傳記中渲染朱震亨「儒」的一面，並在其後主編的《元史》中將朱震亨列入「儒學」類而不是「方技」類。[18] 因此，本文將謹慎分析朱震亨的墓辭傳記，並著重發掘同時代文人文集、地方志和族譜中的史料來重構元代江南社會中朱震亨的生平歷史。[19]

一・朱震亨的地方社會形象

歷史文本和遺跡中的朱震亨面貌多重。據明清的義烏地方志載，朱震亨在

---

[12] 黃溍，〈成全郎江浙官醫提舉葛公墓誌銘〉，李修生主編，《全元文》（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第 30 冊，卷九七八，頁 358-360。

[13] 李存師從陳苑，為陸學傳人，學者稱「俟庵先生」，參考〈靜明寶峰學案〉，黃宗羲著，全祖望續修，王梓材校補，《宋元學案》（收入《四部備要》〔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5〕，子部第 149 冊，據清道光道州何氏刻本校刊），卷九三，頁 5b-6a。

[14] 與朱震亨有關的醫學著作列表，請參考劉時覺，《丹溪學研究》（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2004），頁 82-107。

[15] 宋濂，〈故丹溪先生朱公石表辭〉，《黃譽輯刻補》（收入《宋濂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頁 2131-2138。以下簡稱宋濂，〈石表辭〉。

[16] 戴良，〈丹溪翁傳〉，李修生，《全元文》第 53 冊，卷一六三八，頁 437-445。

[17] 戴良，〈丹溪翁傳〉，頁 437-445。

[18] 宋濂等，《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卷一八九，頁 4320。

[19] 戴良，〈丹溪翁傳〉，頁 437-445。

「鄉賢祠」中被當作「名儒」來祭祀；[20] 在義烏市赤岸鎮，朱震亨亦列名於當地朱氏宗族的祖先中。二〇一〇年筆者曾走訪義烏市赤岸鎮東朱村丹溪陵園。該陵園為赤岸鎮官方網頁推介的重要旅遊景點，園內包括有丹溪廟、丹溪墓及中國歷史上各大名醫的塑像。在丹溪廟中，朱震亨的塑像和土地神、財神並列。據文獻記載，至一九四九年止，當地有朱氏宗祠、丹溪祠、丹溪墓（兩側為朱震亨兒子的墓）。丹溪墓由朱氏子弟輪流看守，清明、冬至均有丹溪後代掃墓祭祀。[21] 一九四九年後，朱氏宗祠改為政府辦事處，丹溪祠坍毀，丹溪墓則毀於文革。[22] 一九九二年，義烏政府資助重建丹溪墓，逐漸形成現今園林式的旅遊面貌。[23]

追溯至宋元之間，朱震亨來自一個有良好科舉紀錄的江南家族。高祖朱良祐 (1142-1214) 雖無功名，但曾延請朱熹的門人徐僑 (fl. 1200) 教兒子們讀書；良祐之子朱中（生卒年不詳）曾應鄉薦。南宋末，朱震亨的祖父輩有七人中進士；改朝換代後，這七人中有五人出任元代州縣級官吏。朱震亨的父輩中有八人通過舉薦、蔭官和掾吏的方式獲得官職。[24] 其中仕途最好的是朱震亨的族叔祖朱叔麒 (1243-1313)，一二六八年中進士；宋亡後，「讀書養親，以醫藥濟人」。至元二十四年 (1287) 元廷派遣程鉅夫下江南訪求南宋士大夫人才，[25] 朱叔麒受邀出任慶元路定海縣尹，以婺州路總管致仕。朱叔麒的兒子們亦出仕：朱繼善 (?-1327) 通蒙古語，曾為國子監伴讀、溧水州判官；朱同善 (1297-1365) 從婺州理學家許謙 (1270-1337) 游學，也曾為兩淮屯府幕僚。[26] 相較之下，朱震亨的祖父朱環 (1232-1317) 無科舉功名，看似寂寂無聞，但從他資助元初地方叛亂，其地方聲望與財力可見一斑。[27] 朱震亨父親早逝，母親戚氏出身於婺州理學世家。[28] 在宋

---

[20] 周士英纂修，崇禎《義烏縣志》（收入《稀見中國地方誌彙刊》〔北京：中國書店，1992〕，第 17 冊，據明崇禎年間刻本影印），卷五，頁 404。

[21] 華犁，〈朱丹溪家鄉調查記〉，《浙江中醫藥大學學報》1981.6：30-32。

[22] 馬堪溫，〈中國古代名醫故里古跡調查〉，王淑民、羅維前主編，《形象中醫：中醫歷史圖像研究》（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7），頁 257。

[23] 劉時覺，《丹溪學研究》，頁 37-38。

[24] 柳貫，〈重修適意亭記〉，李修生，《全元文》第 25 冊，卷七九三，頁 266-268；朱新德，〈東堂公家傳〉，《赤岸朱氏宗譜》（嘉慶十九年〔1814〕木活字本，上海：上海圖書館藏），頁碼不詳。

[25] 宋濂等，《元史》卷一七二，頁 4015-4018。

[26] 鄭柏，〈治中公傳〉，《赤岸朱氏宗譜》卷七，頁 20b-21a。

[27] 元初江南地區局勢並不穩定，婺州地區在至元廿六至廿七年 (1289-1290) 之間約有三起叛亂。一二八九年，台州楊鎮龍反，西攻東陽、義烏，浙東大震。楊氏稱大興國皇帝，設立

濂的筆下，戚氏喪夫之後擔負起撫養朱震亨和奉養朱環夫婦的重任。[29]

在這樣的家族背景中，朱震亨頗為另類。據宋濂的墓辭，早年的朱震亨充滿了豪俠之氣：

> 先生受資爽朗，讀書即了大義，為聲律之賦，刻燭而成，長老咸器之，已而棄去，尚俠氣，不肯出人下，鄉之右族咸陵之，必風怒電激求直於有司，上下搖手相戒，莫或輕犯。時鄉先生文懿許公，講道東陽八華山中，公上承考亭朱子四傳之學，授受分明，契證真切，擔簦而從之者，亡慮數百人，先生歎曰：「丈夫所學，不務聞道，而唯俠是尚，不亦惑乎？」乃摳衣往事焉。先生之年，蓋已三十六矣。[30]

宋濂的論述呈現，朱震亨曾是一個鄉人不敢冒犯的豪俠，在許謙的感染教化下，才放棄「尚俠」而走向「聞道」之路。當然，朱震亨此種豪俠與純儒的多重面向並不是個例，而是延續南宋居鄉士人的氣質。據梁庚堯的研究，南宋士人居鄉常呈現兩極面貌：一是武斷鄉曲的豪橫，多見於地方官的判詞；一是施財濟人的長者，多見於墓誌銘。[31] 宋濂對朱震亨年輕時「尚俠」的行跡著墨不多，但據墓辭中所記，丹溪確實既武斷鄉曲又施財濟人。[32] 可是此「尚俠」的語義所指顯然沒

左右丞相，規模甚大。朱環有「亡奴」參與楊鎮龍事，此奴素與環不合，遂誣稱環亦出資助叛亂，朱環因此而捲入其中，女兒朱壽向浙東宣慰使史弼求情而得免罪。一二九〇年，縉雲民叛亂，置砦峽雲山，近赤岸，曾欲挾朱環為謀帥，兒子朱元斬殺來賊，遂得免。參考黃清連，〈元初江南的叛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49.1 (1978)：37-76；宋濂，《潛溪前集》（收入《宋濂全集》），卷八，〈朱環傳〉，頁 91；宋濂等，《元史》卷一五，頁 321-338。

[28] 戚氏曾祖戚如琥（生卒年不詳），曾從學南宋婺州理學家呂祖謙 (1137-1181)，長兄戚象祖（生卒年不詳）為元道一書院山長。黃宗羲、全祖望，〈麗澤諸儒學案〉，黃宗羲，《宋元學案》卷七三，頁 4b-5a。

[29] 據宋濂撰朱震亨母戚氏的傳記，「時宋亡為元，盜起旁縣，焚盧舍剽劫，家單甚」，她協助公公朱環度過了叛亂危機。宋濂，《芝園續集》（收入《宋濂全集》），卷六，〈元故朱夫人戚氏墓銘〉，頁 1572-1573。

[30] 宋濂，〈石表辭〉，頁 2131-2138。

[31] 梁庚堯，〈豪橫與長者：南宋官戶與士人居鄉的兩種形象〉，《新史學》4.4 (1993)：45-95。

[32] 作為濟人的長者，可見下文朱震亨修水利、整合宗族的事例；武斷鄉曲可見震亨動用官府影響力來審問鄉人偷竊祖墳木材的故事：「細民有斬先生丘木者，先生訊之，民弗服，先生聞于縣，將逮之。人交讓曰：『汝奈何犯仁人耶？』民曰：『計將安出？』人曰：『先生，長者也，急舁木還之，當爾貸。』民從之，先生果寘而不問」。宋濂，〈石表辭〉，頁 2131-2138。

有擴展至類似明代士人談兵論劍的風尚。[33]

朱震亨由俠轉而儒和其家鄉婺州的社會文化環境密切相關。婺州在元代形成了跨越世代、有地方認同的理學群體。此群體宣稱學術承自朱熹正統，許謙為其中著名理學家之一，致力於講論解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著有《讀四書叢說》。[34] 按照戴良的記述，朱震亨三十六歲拜於許謙門下，是為人生重要轉折點。在朱熹理學正統傳人的門下，朱震亨不僅完成了從「尚俠」到「聞道」的轉化，同時也棄科舉而立志於醫學：

> 翁自幼好學，日記千言。稍長，從鄉先生治經，為舉子業。後聞許文懿公得朱子四傳之學，講道八華山，復往拜焉。益聞道德性命之說，宏深粹密，遂為專門。一日，文懿謂曰：「吾臥病久，非精於醫者，不能以起之。子聰明異常人，其肯游藝於醫乎？」翁以母病脾，於醫亦粗習，及聞文懿之言，即慨然曰：「士苟精一藝，以推及物之仁，雖不仕於時，猶仕也。」乃悉焚棄向所習舉子業，一於醫致力焉。[35]

事實上，朱震亨並不是因為許謙鼓勵行醫才「有志於醫」，據其《格致餘論》自述應始於三十歲。[36] 同時，棄科舉行醫的論述，過分簡化了朱震亨職業選擇和實踐個人抱負的過程。首先，朱震亨考科舉和行醫的先後時間順序並不符合棄仕行醫。延祐二年 (1315) 元廷第一次開科舉，朱震亨已三十五歲，晚於其「有志於醫」的時代。其次，一三一六年，三十六歲的朱震亨就成為許謙的弟子，或許正是因為許謙講授的經注就是元代科舉考試的內容。[37] 亦即，在「有志於

---

[33] 王鴻泰，〈武功、武學、武藝、武俠：明代士人的習武風尚與異類交游〉，《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5.2 (2014)：209-267。

[34] 元代婺州的理學群體，最著名有何基 (1188-1269)、王柏 (1197-1274)、金履祥 (1232-1303) 和震亨的老師許謙，號稱是朱熹高足黃幹 (1152-1221) 的嫡傳弟子，參考黃宗羲，《宋元學案・北山四先生學案》卷八二，頁 1-48；孫克寬，《元代金華學述》（臺中：私立東海大學，1975），頁 44；Peter Bol, “The Rise of Local History: History, Geography, and Culture in Southern Song and Yuan Wuzhou,”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1.1 (2001): 37-76；陳雯怡，〈「吾婺文獻之懿」——元代一個鄉里傳統的建構及其意義〉，《新史學》20.2 (2009)：43-114。

[35] 戴良，〈丹溪翁傳〉，李修生，《全元文》第 53 冊，卷一六三八，頁 437-445。

[36] 朱震亨，〈格致餘論序〉，浙江省中醫藥研究院文獻研究室編校，《丹溪醫集》（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3），頁 1。

[37] 和宋代科舉考試標準不同，元代科考多採取二程、朱熹對儒家經典四書五經的註釋為標準，譬如四書和《詩經》均用朱熹的註釋，參考姚大力，〈元朝科舉制度的行廢及其背景〉，氏著，《蒙元制度與政治文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頁 219-278。

醫」以後，震亨並沒有放棄科舉。再者，許謙鼓勵朱震亨放棄科舉還有特定的時代背景。蒙元時代作為選官制度的科舉考試，其重要性遠不如宋代和明代，錄取機率也非常低。[38] 在許謙看來，游藝於醫更重要，於是鼓勵一直在行醫的朱震亨徹底放棄希望渺茫的科舉。但戴良特地渲染許謙的鼓勵，可見其試圖從理學角度賦予朱震亨業醫正當性的意識。

然而，仕與醫在元代本不是對立的選擇，在科舉入仕這條狹徑以外，行醫反而提供了另一條出仕道路。元政府對醫療非常重視，除沿襲宋代地方醫學和惠民藥局的設置外，還設立三皇廟供醫師祭祀。[39] 這些機構設置相應地提供了士人以醫學才能擔任醫學官職的機會，有些人甚至可以憑藉治療高官而獲得高階文官的職位。[40] 另一方面，一部分人在以與醫學無關的「吏」的身分進入政府機構後，繼續行醫，為達官貴人治病，而且醫術精湛。比如項昕（生卒年不詳）跟從外祖父學醫，「年未成童，已諳誦岐、扁、《素》、《難》、王叔和《脈經》」，曾和朱震亨討論金元劉完素、張子和、李杲的醫學思想，也有大量實際治療的經驗。但他主要的社會身分是輔助地方官員行政的書吏。[41] 這種身分模糊但受士大夫追捧的醫者在江南並不少。台州陳基 (fl. 1370) 記載蘇州府吏曾彥魯（生卒年不詳），「祿不制以醫事，職守不掌於醫師，而邦之有疾者造之恐後」。[42] 可是，朱震亨一生卻沒有擔任任何醫學官職，刻意避免以醫出仕。據弟子劉純〈醫家十要〉中載，丹溪教導子孫「不可輕信人言，求為學官」，「恐因虛名，而妨實利也」。[43]

朱震亨科舉只參加兩次，其後也避免以醫出仕。終其一生，看似只致力於鑽研醫學，其實不然。對於最終位列鄉賢祠並享有「名儒」稱號的朱震亨，投身家

---

[38] 關於元代科舉制度，請參考姚大力，〈元朝科舉制度的行廢及其背景〉，頁 219-278；蕭啓慶，〈元朝科舉與江南士大夫之延續〉，氏著，《元代的族群文化與科舉》（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8），頁 147-176。

[39] 梁其姿，〈宋元明的地方醫療資源初探〉，氏著，《面對疾病》，頁 127-154；Reiko Shinno, “Medical Schools and the Temples of the Three Progenitors in Yuan China: A Case of Cross-Cultural Interactions,”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7.1 (2007): 89-133.

[40] 陳元朋，《兩宋的「尚醫士人」與「儒醫」》，頁 270-273。

[41] 項昕「在杭為府吏，為肅政府書吏，在鄞為帥府令史，在閩掾行中書，掾行臺」，見戴良，〈抱一翁傳〉，李修生，《全元文》第 53 冊，卷一六三八，頁 454-462。

[42] 陳基，〈贈曾彥魯序〉，李修生，《全元文》第 50 冊，卷一五三〇，頁 249-250。

[43] 劉純著，姜典華主編，《劉純醫學全書》（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9），〈《雜病治例》自序〉，頁 468。

族和地方事務的經歷至關重要。宋濂的墓辭點出，對決意不仕轉以「求道」為己任的朱震亨來說，替代選擇是家族和地方事務：

> 歲當賓興，先生應書秋闈，幸沾一命，以驗其所施，再往，再不利，復歎曰：「不仕固無義，然得失則有命焉。苟推一家之政，以達於鄉黨州閭，寧非仕乎？」[44]

這種選擇，在宋明士人從「得君行道」轉向「覺民行道」的思想風潮中是絕對具有正當性。[45] 作為投身地方事務的象徵，宋濂列舉了朱震亨致力於修建祖先祠堂、拒抗政府苛捐雜稅、修築蜀塘水利等事務為例，[46] 其中組建赤岸朱氏宗族的活動尤為重要。雖然宋元之間地方士人組織家族的活動並不可簡約為明清宗族形成的源頭，[47] 但在明清族譜所書寫的赤岸朱氏宗族史中，宋元之間的一些活動被當作是宗族的早期歷史。而無科舉頭銜的朱震亨是元代建立祠堂、組織朱氏家族祭祀的關鍵領導人物。[48]

在赤岸，從朱震亨的高祖朱良祐開始，已經有意識地組織當地朱姓子孫祭祀。他曾留給子孫三十六畝祭田，以供祖先祭祀，至朱震亨的時代仍然存在。[49] 在宋元江南，這個祭田的規模並不大。[50] 曾祖朱中曾按朱熹《家禮》的建議祭祀四世祖。[51] 然而，直到朱震亨以前，朱家的祭祀都是處於「有恒祭而無恒所」的

---

[44] 宋濂，〈石表辭〉，頁 2131-2138。

[45] 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北京：三聯書店，2004）。

[46] 何淑宜對元代士人祭祖與身分認同的分析中，將朱震亨作為元代未仕儒者以建祠祭祖來踐道的典型個案，參考何淑宜，《香火：江南士人與元明時期祭祖傳統的建構》（臺北：稻鄉出版社，2009），頁 93-113。

[47] Patricia Ebrey 認為 1000-1400 年之間的家族組織活動雖然看似和明清宗族類似但實質不可同日而語，Patricia Ebrey, “The Early Stag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Descent Group Organization,” in *Women and the Family in Chinese History*, ed. Patricia Ebre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pp. 107-143.

[48] 此祠堂並不是人類學和歷史學所探討明清以後宗族的家廟式祠堂，關於宋以後祭祖禮儀沿革的歷史，請參考 David Faure, *Emperor and Ancestor: State and Lineage in South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9-11；科大衛，〈祠堂與家廟——從宋末到明中葉宗族禮儀的演變〉，《歷史人類學學報》1.2 (2003)：1-20。

[49] 朱震亨，〈修築祭田記（補刻）〉，韓慧基修，雍正《義烏縣志》（雍正五年〔1727〕刻本，上海：上海圖書館藏），卷一九，頁 20b-21b。

[50] 比較大規模的祭田，比如宋濂記載宋末莆田林氏有二千畝祭田，參考 Ebrey, “The Early Stag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Descent Group Organization,” pp. 133-134.

[51] 朱叔麒，〈敬齋公傳〉，《赤岸朱氏宗譜》卷七，頁 5a-9b；宋濂，〈石表辭〉，頁 2131-2138。

狀態。[52] 約一三三七年，朱震亨將「適意亭」改造為祖先祭祀場所，並期望子孫以後固定在此祭祀：

> 吾〔朱震亨〕家故有適意亭，吾高祖東堂府君字元德之所作也。府君與宋工部侍郎毅齋先生徐文清公友善，二子實從之游。府君時先生之家居也，為作斯亭。……府君下世，亭且缺廢，吾曾伯祖贈婺州路總管府治中府君嘗一營治之……初，面亭有池，吾季父溧水府君除瓦礫，興構築，復作亭池上，未成而季父卒官。今吾將經緝〔葺〕是亭，即故址作金威祀，以東堂府君侑，且為別室，奉先生之主焉。蓋金威神祠於鄉，府君始作亭，而吾子孫承宗弗墜，尚先生之教秩而祠之，示有先也。[53]

「適意亭」原本是朱良祐設立的家塾，朱震亨的族叔祖朱叔麒、族叔父朱繼善曾兩度修繕此亭。正如前文提及，相對良祐其他子孫，朱叔麒和朱繼善二人在科舉仕途比較成功，所以擔當了修亭主導者的角色，朱震亨則承接了這份工作。「適意亭」可能和祭田類似，是宋末以來朱良祐子孫所共有的財產之一，故而朱震亨可將之改建為祭祖建築。宋濂在〈石表辭〉中將朱震亨此舉稱作建「祠堂」，還聲稱朱震亨主持的祭祀活動均依據朱子《家禮》舉行。朱震亨對祭祀禮儀的考訂在地方社會頗具權威，元明之間著名的浦江鄭氏義門，十世同居共財，「其家所講冠婚喪祭之禮，每咨於先生（朱震亨）而後定」。[54]

然而，在地方深孚眾望的禮儀權威朱震亨，在祠堂的祭祀祖先活動，並不完全符合朱熹《家禮》中對士人祭四世祖的設想。朱震亨的具體做法，首先是「作金威祀，以東堂府君侑」。金威將軍據傳姓朱，是魏晉時代的官員，「民歲時歌舞，奉嘗之不絕」，是流行的地方民間信仰。其次，確認金威將軍的附祀均為朱姓，將不姓朱的塾師徐僑從適意亭中移走，「為別室奉先生（徐僑）之主」。再者，請地方大儒柳貫為作〈重修適意亭記〉，號稱「赤岸之有朱氏，緜歷殆餘千年」，追溯從魏晉南北朝到五代再到元代的朱姓譜系，並提出義烏縣的姓朱者皆來自同一始遷祖，只不過在唐末五代中昭穆失散而已。[55] 以上做法中，比附民間

---

[52] 宋濂，〈石表辭〉，頁 2131-2138。

[53] 柳貫，〈重修適意亭記〉，李修生，《全元文》第 25 冊，卷七九三，頁 266-268。

[54] 宋濂，〈石表辭〉，頁 2131-2138。

[55] 柳貫將金威將軍、朱禮以及義烏縣的朱姓百姓連在一起的敘述：「烏傷，漢縣也。直其南東，鄉曰雙林，村曰蒲墟，有朱氏者世居之。按《志》，自晉東陽太守諱垣始徙，至臨海太守諱汎，遂佔籍為縣人。……《譜》云：五代之亂，一翁十八季。翁最得上壽，嘗冶鉄作羅漢像，使季人奉其一，散而居於村之西東。至今縣多朱氏，人謂有像者為朱氏之世之

神祇金威將軍的行為，顯然不符合朱熹的觀點。可是這種比附對歷史行動者有強烈的現實意義，利用了金威神祀的威望來建立家族祭祀的權威，甚至是以朱氏宗族來重整地方社會的秩序。

但是，朱震亨所建的祠堂並不可簡單地等同於明清宗族制度下的祠堂，我們也不知道究竟誰在適意亭中祭拜祖先。此祠堂之後的歷史記載很模糊，崇禎《義烏縣志》提到縣南清德里（赤岸的另一名稱）有「二朱祠」，「祀臨海太守朱汎、金威將軍朱禮」，但沒有說這是朱姓的祖先。[56] 嘉慶《義烏縣志》提到縣南曾有「塘山廟」，在「野墅朱村，村民指為上祖，即晉東陽太守朱垣、臨海太守朱汎、金威將軍朱禮」；至一七九一年所建之「二朱祠」，才清楚地記為當地朱氏宗族的祖先祭祀祠堂。[57]「赤岸朱氏」族譜現有五種存於上海圖書館，撰於一八一四至一九二五年，顯示至少整個十九世紀赤岸宗族組織是比較嚴密的。總而言之，雖然在宋元、元明易代的戰亂中，一些地方大族常常受到各種衝擊而衰敗，[58] 但是赤岸朱姓在朱震亨的主導下，慢慢形成了一定規模的宗族組織。

本節從地方視角審視了具有儒、俠、醫多重面貌的朱震亨。學界已揭示朱震亨作為理學家在哲學層面重構醫學中的陰陽身體論述的重要性。[59] 然而，在社會史的層面上，朱震亨作為豪俠和宗族組織者的一面，對於醫學史中的丹溪偶像以及丹溪學派的形成也至關重要。和其他元明之間的名醫相較，朱震亨在地方社會的財力和文化權威都超過了普通醫者，甚至普通儒者。雖然理學家宋濂讚頌朱震亨由俠轉儒，但某種程度上，他作為俠的氣質依然存在。從朱震亨擔當建祠堂和修祭田水利的任務，代表鄉民上書義烏縣僉事改赤岸名為清德里，[60] 以及向婺州

徵，而像尚八九在，然族散代遷，昭穆有不相通者矣」。見〈重修適意亭記〉，李修生，《全元文》第 25 冊，卷七九三，頁 266-268。

[56] 周士英，崇禎《義烏縣志》卷五，頁 416。

[57] 程瑜、諸自穀修纂，嘉慶《義烏縣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浙江府縣誌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3〕，第 53 冊，據嘉慶七年〔1802〕刻本影印），卷七，頁 171。

[58] 如寧波戴表元 (1244-1310) 提到「邑中故家，雖衣冠強盛，如李、楊、黃者，亦皆逋播蕩析」，吳澄 (1249-1333) 在江西也看到「異代高門巨室，失其固常，無所控倚，身殞家圮，類十八九」。戴表元，〈送杜子問赴教官序〉，李修生，《全元文》第 12 冊，卷四一四，頁 38-39；吳澄，〈將仕郎師濟叔墓誌銘〉，李修生，《全元文》第 15 冊，卷五一五，頁 475-477。

[59] Furth, “The Physician as Philosopher of the Way,” pp. 423-459.

[60] 朱震亨，〈上余僉事書〉，《赤岸朱氏家乘》（清代年份不詳木活字本，上海：上海圖書館藏），卷七，頁碼不明。

地方政府提供判案諮詢，抗議元朝中央政府的加稅政策等等事例，[61] 可以見出他必定擁有不錯的經濟實力，對禮儀、法律的解釋在地方上也相當具有信服力。相較之下，與朱震亨並駕齊驅的名醫平江路醫學教授葛應雷雖「治廟宇，闢土田，教育其弟子員，後多為良醫」，但是葛及其弟子在歷史上沒有留下任何聲音。[62]

二・元末明初以丹溪為中心的師徒網絡

自十四至十五世紀中，朱震亨的醫學弟子們形成了世代連綿的師徒網絡，而且他們都對丹溪有非常高的忠誠度，有效地傳播了丹溪的醫學名聲。[63] 隨著時間推移，這些弟子的活動範圍也從婺州、蘇州、江南擴散至明朝各地，並部分進入體制，服務於太醫院和各地王府。宋濂誇讚朱震亨的入室弟子之一戴思恭 (1324-1405)「以其學行於浙河之西，從之者日益多，由是先生（朱震亨）之道沾被滋廣，而三尺之童亦知先生之賢」。雖有溢美戴思恭之嫌，卻不失精準地披露明初丹溪弟子對建立傳播朱震亨醫名的貢獻。[64]

丹溪弟子的醫學群體部分建立於婺州地方士人網絡之中。宋元之間追隨程朱理學的婺州士人對地方傳統和士人群體有著非常強烈的認同。[65] 朱震亨及其最著名的入室弟子戴思恭和趙良仁 (1315-1395) 都和這個理學士人群體有交集。[66] 朱震亨母親的家庭是從學呂祖謙的理學世家，震亨自己則拜許謙為師。[67] 趙良仁的父親曾為王府塾師，良仁和兄長一起就學於婺州吳萊 (1297-1340)、柳貫 (1270-1342) 門下，因二人對醫學表現出強烈興趣，所以柳貫推薦趙氏兄弟拜朱震亨學

---

[61] 宋濂，〈石表辭〉，頁 2131-2138。

[62] 黃溍，〈成全郎江浙官醫提舉葛公墓誌銘〉，李修生，《全元文》第 30 冊，卷九七八，頁 358-360。

[63] 朱震亨入室及再傳、三傳等弟子的系譜，參考劉時覺之《丹溪學研究》，頁 43-62。

[64] 宋濂，《翰苑續集》（收入《宋濂全集》），卷二，〈題朱彥修遺墨後〉，頁 809。

[65] Peter Bol, " Neo-Confucianism and Local Society, Twelfth to Sixteenth Century: A Case Study," in *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 ed. Paul Smith and Richard von Glah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3), pp. 241-283；陳雯怡，〈「吾婺文獻之懿」〉，頁 43-114。

[66] 在婺州地區的眾多弟子中，雖然朱震亨之子朱玉汝也是丹溪傳人之一，但戴思恭和趙良仁二人毫無疑問是傳播丹溪學說最有力的人物，參考劉時覺，《丹溪學研究》，頁 44-47。

[67] 參考前文註 28 和註 34。

醫。[68] 戴思恭的父親戴堯（又作戴士垚）跟朱震亨學醫，叔父是著名的文人戴良。戴思恭和趙良仁之間也有姻親關係，戴的姊姊嫁於趙良本。[69] 朱震亨的另一個弟子蕭山樓英 (1332-1400)，是戴思恭的表弟。[70] 婺州鄉里之間的網絡，提供了丹溪崇拜者形成醫學群體的初步條件。其結果不止幫助丹溪在婺州建立醫學名聲，而且隨著他們走向江南以及明政權中心而發揮更大的影響。

早在元末，戴思恭和趙良仁已遷往蘇州行醫。蘇州作為江南的都市中心，醫者之間的競爭非常激烈：

> 今之良醫，蓋其多莫逾於中吳矣。夫豈以吳地富饒，人鮮輕身重財，故挾是術者趨之恆多歟。[71]

戴思恭成功地在名醫林立的蘇州城嶄露頭角，不但名公鉅卿爭先請他治病，蘇州醫者也紛紛嚮往向戴思恭學習丹溪真傳，而非戴思恭自己的醫學。[72] 據蘇州王鏊 (1450-1524)《守溪筆記》、楊循吉 (1456-1544)《蘇談》，蘇州人王賓 (fl. 1340-1409) 為學習丹溪的真傳，不擇手段地從戴思恭處偷走丹溪的醫案，由此蘇州的醫學逐漸繁榮：

> 今吳中醫稱天下，蓋有自矣。初金華戴原禮學於朱彥修，既盡其術，來吳為木客。吳人以病謁者，每製一方，率銀五兩。王仲光為儒，未知醫也。慕而謁焉，因諮學醫之道。原禮曰：熟讀《素問》耳。仲光歸而習之三年，……時仲光雖得紙上語，未能用藥。原禮有《彥修醫案》十卷，秘不肯授仲光。仲光私窺之，知其藏處，俟其出也，徑取之歸……於是仲光之醫名吳下，吳下之醫由是盛矣。[73]

王賓出身相士家庭，但他自幼習儒，拒習家傳相術，是元末明初「吳中三高

---

[68] 宋濂，《芝園全集》（收入《宋濂全集》），卷六，〈太初子碣〉，頁 1570。

[69] 戴良，〈趙君夫人戴氏墓誌銘〉，李修生，《全元文》第 53 冊，卷一六四一，頁 539-540。

[70]《蕭山石塔樓氏宗譜》，轉引自劉時覺，《丹溪學研究》，頁 49。

[71] 王禕，〈贈醫師張君序〉，李修生，《全元文》第 55 冊，卷一六八四，頁 247-248。

[72] 鄭沂，〈明奉政大夫太醫院使顯一府君行狀〉，方春陽編著，《中國歷代名醫碑傳集》（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9），卷一五，頁 372-373。

[73] 楊循吉，《蘇談》（收入《紀錄彙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9〕，第 69 冊），卷二〇〇，頁 3a-b；另一版本見王鏊，《守溪筆記》（收入《紀錄彙編》第 39 冊），卷二二四，頁 25a-26a。

士」之一。[74] 依照上文，作為儒者的王賓想向戴思恭學醫，但熟讀《素問》三年的他卻無法真正地行醫治病。自從偷讀丹溪醫案後，王賓熟習醫術，甚至開創「吳下之醫」的傳統。此敘事顯然誇張了戴思恭和王賓對蘇州醫學發展的重要性。邱仲麟指出江蘇醫學之盛起，並不始於戴思恭；但蘇州地方筆記中將戴思恭和王賓奉為始祖並非憑空捏造。邱文所列舉明代蘇州世醫大部分人都和戴思恭、王賓、趙良仁有師徒關係。[75] 和王賓同列「吳中三高士」的韓奕 (1334-1406) 和王履 (1332-1383)，也是朱震亨的弟子。王履以畫著名，醫書寫作亦多產，但如何成為朱震亨弟子的事蹟不詳。[76] 韓奕自幼雙目失明，家族自北宋開始經營藥店，後來播遷至蘇州，仍以賣藥為生，店名為「秘藥巢」。因為傾慕朱震亨的醫名，韓奕曾在元末戰亂中從蘇州前往金華，拜丹溪門人為師。[77] 王賓的好友蘇州王恆（生卒年不詳）也是俯首師事戴思恭的醫者。王恆及其兄長「世家為醫」，十七歲「泛海之崇明，從師以求丹溪朱氏之學。時道梗，又間行至金華以終其所學焉」。[78] 與戴思恭、王賓、王恆均有交集的王行 (1331-1395)，幫助會稽人徐用誠 (?-1384) 在蘇州士人圈中募款，以出版丹溪的醫著。[79] 由此可見，雖然在筆記傳說中王賓偷戴思恭的私藏醫案，但實際上戴、王二人都是傳播丹溪的核心，在他們周圍形成了仰慕丹溪的學醫師徒群體（參考圖一）。

---

[74] 姚廣孝，〈王光庵傳〉，王賓，《光庵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出版公司，1995-1997〕，集部第 28 冊，據北京大學藏清抄本影印），附錄，頁 2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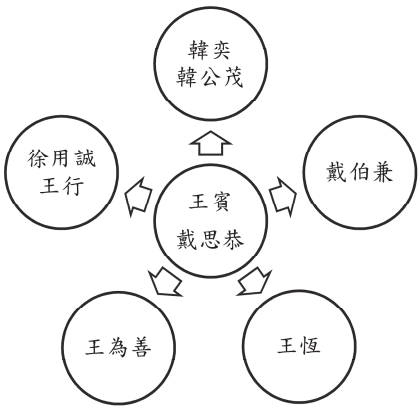
[75] 邱仲麟，〈綿綿瓜瓞——關於明代江蘇世醫的初步考察〉，《中國史學》13 (2003)：62-63。

[76] 王鏊，《姑蘇志》（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上海：上海古籍書店，1990〕，第 11-14 冊），卷五六，頁 726。

[77] 王彝，《王常宗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香港：迪志文化出版公司，2002〕，第 1229 冊），卷一，〈秘藥巢記〉，頁 12a-13b。

[78] 鄭沂，〈明奉政大夫太醫院使顯一府君行狀〉，頁 372-373；王賓，《光庵集》，〈王恆立方墓〉，頁 222。

[79] 王行，《半軒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第 1231 冊），補遺，〈募刊朱彥修醫書疏〉、〈募刊醫書疏〉，頁 32b-34a。



圖一

與戴思恭類似，趙良仁元末已在蘇州行醫。除元末明初戰亂時期曾短暫挈妻小回婺州外，大多定居於蘇州，他的子孫也在蘇州為醫。[80] 趙良仁的醫術也吸引蘇州府及附近地區的人來拜師學丹溪真傳。如松江李肅（生卒年不詳），隨趙良仁習醫，永樂初拜松府醫學正科。[81] 無錫華悰韡 (1340-1397)，出身故家舊族，拜趙良仁為師習醫。[82] 在史書中，這些人和戴思恭的弟子一樣，無一例外地遙崇朱震亨為老師，而不是親身教習醫學的老師戴思恭和趙良仁（參考圖二）。

圖二

[80] 王鏊，《姑蘇志》卷五六，頁 728。

[81] 陳夢雷編，《古今圖書集成醫部全錄》（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59），卷五一一，頁 257。

[82] 趙友同，〈貞固處士傳〉，華悰韡，《慮得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第 1122 冊，據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嘉靖十一年〔1532〕華從智刻本影印），卷一，頁 268-269。

以戴思恭、趙良仁為中心的醫者群體也壟斷了和朱震亨有關的醫學書籍。首先，由王賓偷書傳聞的細節可見外人獲取丹溪醫著之困難。其次，以丹溪為名流傳的醫案，執筆者是戴思恭和趙良仁，刊刻發行者也來自此群體。[83] 比如王行和徐用誠在蘇州籌募刊刻丹溪醫書的資金；[84] 趙良仁和戴思恭分別刊刻《格致餘論》和《丹溪醫案》。[85] 再者，即使丹溪醫書付諸刊刻，發行量也十分有限。明初宋濂的弟子方孝孺 (1357-1402) 的親戚學醫，想讀朱震亨的著作，方孝孺還要寫信輾轉託人向戴思恭求索一套。由此可見普通人恐怕更難以獲得丹溪醫書。[86] 一四一五年明廷下令刊印《格致餘論》、《局方發揮》、《丹溪醫案》廣賜天下以前，丹溪醫書「近惟兩浙為醫多用之，然率秘之」，習醫者若無如方孝孺般的人脈網絡，接觸朱震亨的醫書非常困難。[87]

元明易代期間，朱震亨的同鄉宋濂、劉基 (1311-1375) 等人成為明太祖朱元璋的得力助手。宋濂以文學受太祖器重，拜翰林院學士；劉基以計謀見重，封誠意伯。[88] 與此同時，戴思恭從蘇州城名醫轉變為新朝權貴信賴的名醫：

> 劉之學，朱先生得之最深，大江以南，醫之道本於《內經》，實自先生發之。原禮乃其高弟弟子，其用心也篤，故造理為特精；其傳授有要，故察證無不中，亦可謂賢也已矣。近代京師，薦紳之家無不敬愛之，服其劑者，沉痾豁然如洗。或欲薦為醫官，辭不就。遂賦詩以餞其董還，且請予為序。[89]

---

[83] 當時在蘇州流行的丹溪醫案至少有兩種：一是戴思恭自稱在朱門下習醫所記，經宋濂編輯而成的《丹溪醫按》；一是趙良仁整理的《丹溪藥要》，原始記錄者不明，只知也是一個以「門人」自稱的作者所記。鄭沂，〈明奉政大夫太醫院使顯一府君行狀〉，頁 372-373；王恆，〈《丹溪醫按》序〉，劉時覺、薛軼燕編校，《丹溪逸書》（上海：上海中醫藥大學出版社，2005），頁 3；華悰韡，《慮得集》，〈代題《丹溪藥要》序〉，頁 286。

[84] 王行，《半軒集・補遺》，〈募刊朱彥修醫書疏〉、〈募刊醫書疏〉，頁 32b-34a。

[85] 陳基，〈朱氏格致餘論序〉，李修生，《全元文》第 50 冊，卷一五三三，頁 301-302。

[86] 方孝孺，《遜志齋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集部第 323-325 冊），卷一〇，〈與鄭叔度八首〉，頁 238。

[87] 楊士奇，《東里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第 1238-1239 冊），續集，卷二〇，〈跋朱氏三書〉，頁 629。

[88] 朱元璋攻下金華以後婺州士人就成為他的重要智囊，「及太祖下金華，定括蒼，聞基及宋濂等名，以幣聘」。張廷玉，《明史》（收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新漢籍電子資料庫」〔清武英殿本底本〕），卷一二八，〈劉基傳〉，頁 3777-3782；卷一二八，〈宋濂傳〉，頁 3784-3788。

[89] 宋濂，《翰苑續集》（收入《宋濂全集》），卷二，〈送戴原禮還浦陽序〉，頁 805-807。

戴思恭雖多次辭醫官不就，然明廷卻屢次徵召。[90] 所以，洪武十九年(1386)，六十三歲的戴思恭赴北京任太醫院御醫，為燕王朱棣醫病。建文帝時擢升為太醫院使，[91] 永樂二年 (1404) 以八十一歲高齡致仕。[92] 戴思恭在太醫院供職近二十年，太醫院醫官中出現大量丹溪弟子，且居高位。[93] 繼任戴思恭的太醫院院使淮南蔣用文 (1351-1424)、湖北袁寶 (1363-1424)，都跟隨戴思恭習「丹溪之學」，以丹溪傳人自居。[94] 蘇州王賓、趙良仁等人的後代也任職於太醫院，王賓傳「丹溪之學」予弟子，其中盛寅 (1374-1441) 一四二五年為南京太醫院院使，陸尹 (1375-1442) 為醫士，韓叔暘（生卒年不詳）為院判。盛寅的家族子孫亦多人入太醫院。[95] 與王賓齊名的吳中高士、丹溪弟子韓奕之姪韓奭（生卒年不詳），經戴思恭推薦為燕王府良醫正，後升太醫院使。[96] 趙良仁之子趙友同 (1364-1418) 為太醫院御醫，並在太醫院中教名醫子弟讀書。[97] 從十五世紀中蘇州文人「凡今京師以醫名者，大半皆吳人也」中，[98] 可以一窺尊崇丹溪的蘇州醫者網絡在明初太醫院的勢力。

---

[90] 戰爭中對醫者需求比較大，但即使到洪武、永樂年間，明廷仍多次從全國徵召醫者，永樂年間太醫院有千餘人，宣德年間有六百餘人，楊士奇，《東里集・續集》卷三二，〈贈太醫院使袁君墓表〉，頁 8a-10a；胡濙的奏摺，見陳文等，《明英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卷一一，「宣德十年十一月甲申」，頁 209。

[91] 在明代太醫院的架構中，院使正五品、院判正六品、御醫正八品、吏目從九品，醫士為雜職，無品級無俸祿。邱仲麟，〈綿綿瓜瓞〉，頁 62-63。

[92] 明代許多官私史書中批評戴思恭作為醫官致仕賜賞過為豐厚，甚至超出一般「庶僚」的待遇，比如王世貞，《弇山堂別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5，據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本影印），卷七七，頁 3316。

[93] 邱仲麟，〈綿綿瓜瓞〉，頁 62-63。

[94] 楊士奇，《東里集・續集》卷三二，〈贈太醫院使袁君墓表〉，頁 8a-10a。

[95] 錢溥，〈太醫院御醫盛寅墓表〉，焦竑，《國朝獻徵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525-531 冊，據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四年〔1616〕徐象標曼山館刻本影印），卷七八，頁 230-232；徐有貞，《武功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第 1245 冊），卷四，〈陸仲文墓誌銘〉，頁 92a-94b；楊士奇，《東里集・續集》卷三三，〈韓母太安人王氏墓表〉，頁 26b-28a。

[96] 楊士奇，《明太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卷一一三，「永樂九年二月壬寅」，頁 1440。

[97] 倪謙，《倪文僖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第 1245 冊），卷二八，〈牧庵先生墓誌銘〉，頁 30a-32b。

[98] 顧清，《東江家藏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第 1261 冊），卷二九，〈慎庵錢君配徐孺人合葬墓表〉，頁 12a-14a。

而且，與同鄉士人宋濂、戴良、劉基等人悲劇結局不同，這一群太醫院的醫官並沒有因為明初政局動盪而遭到政治清算。[99] 戴思恭雖曾服務於建文帝，靖難之變以後也只是致仕而已。部分原因是醫官和庶僚的身分設定不同，醫官的醫術比政治立場重要；部分原因也與他的長子戴伯兼（生卒年不詳）以御醫的身分隨朱棣征伐有關。[100] 當然，朱震亨的門生並非所有人都像戴思恭一樣騰達，有些人被謫戍鳳陽或者邊疆，如趙道震（生卒年不詳）被迫徙籍定遠，劉純遷至陝甘；也有一些人選擇不為醫官，樓英及其子，多次為明太祖、成祖治病，但賜官不受，留在家鄉蕭山。[101]

總而言之，在十四至十五世紀中期，蘇州城和太醫院中浮現了一群鬆散結合的醫者群體。這些醫者通常以授受醫學之故建立縱向師徒關係，彼此之間同時也存在同鄉、交友、通婚的橫向關係；但他們並沒有形成制度化的學術共同體，醫學理念也未必全然一致。然而，無論在蘇州還是太醫院，這些醫者無一例外地忠誠地尊丹溪為祖師，也正是因為這些人堅持以丹溪為師的忠誠，朱震亨才得以成為超越時空的「儒醫」偶像。

三・儒醫、文本與學派的形成

在宋以後「儒醫」興起的潮流中，閱讀經典文本的訓練被強調為醫學訓練最合法、重要的途徑。最典型的例子是宋濂對「醫不三世，不服其藥」的解釋。此典出自《禮記》，唐代孔穎達 (574-648) 注疏提出兩種不同的解釋：「三世」是指父子世代習醫相傳三世，或者是指《黃帝針灸》、《素女脈訣》和《神農本草》三本古代醫經。宋濂在給同鄉醫者的贈序中，認為「三世」是指三種文本：

> 古之醫師必通於三世之書。所謂三世者，一曰《針灸》，二曰《神農本草》，三曰《素女脈訣》。《脈訣》所以察證，《本草》所以辨藥，《針灸》所以祛疾。非是三者，不可以言醫。……夫醫之為道，必志慮淵微，機穎明發，然後可與於斯，雖其父不能傳其子也。吾鄉有嚴生者，三世業

[99] 宋濂因長孫坐胡惟庸案而流遷茂州，劉基傳聞被毒死，戴良則因心懷元朝、拒受明太祖官職而自裁，《明史》卷一二八，〈劉基傳〉，頁 3777-3782；卷一二八，〈宋濂傳〉，頁 3784-3788；卷二八五，〈戴良傳〉，頁 7312。

[100] 鄭沂，〈明奉政大夫太醫院使顯一府君行狀〉，頁 372-373。

[101] 劉時覺，《丹溪學研究》，頁 43-49。

醫矣，其為醫，專事乎《大觀》之方，他皆憒憒，絕弗之省。又有朱聘君，家世習儒，至聘君始以醫鳴，醫家諸書，則無不精覽。一少年病肺，氣上喀喀鳴喉中，急則唾，唾血成縷。嚴曰：「此瘵也，後三月死」。聘君曰：「非也，氣升而腴，中失其樞，火官司令，爍金於爐，是之謂肺痿，治之生」。已而果然生。一六十翁，患寒熱，……嚴曰：「此痰也，不治將差。」聘君曰：「非也……藥之則瘳，不藥則劇。」已而果劇，治乃愈。一女婦有噦疾，嚴曰：「此寒噦也，法宜溫。」聘君曰：「非也。……是之謂惡阻，在法不當治，久則自寧，且生男。」言後輒驗。夫嚴生之醫三世矣，聘君則始習為之，而優劣若是者，醫其可以世論否耶！[102]

宋濂在此以「朱聘君」的事蹟來驗證後一種「三世」的解釋，其原型極有可能就是朱震亨：首先這位朱姓醫者是宋濂的同鄉，其次作為對未仕人士的尊稱「聘君」，宋濂〈石表辭〉和黃宗羲《宋元學案》均使用它來稱呼朱震亨。[103] 這位家世業儒、遍覽醫書的朱聘君，在醫學實踐中完勝三代業醫的嚴姓醫者。宋濂援引此例意圖證明，醫學的精微之處無法由父傳子，醫之「道」無法世襲，由儒入醫的醫者最可信賴，醫學最合法的訓練途徑是經典文本訓練，而非世代家族傳承的「世醫」。[104]

可是，朱震亨學醫的經歷並沒有宋濂所描述的那麼簡單。雖然，朱震亨三十歲即已通讀《素問》及金元諸家的著作，充分具備文本訓練，但直到四十四歲，他一直在四處尋師指點，目的就是為了解決文本閱讀與實際操作中的矛盾。朱震亨曾至浙江杭州、安徽宣城、江蘇南京乃至河北，認為「江浙間無可為師者」，只有北方醫者可學。[105] 朱震亨如此推尚北方醫者並不是特例，同代江南名醫中，

---

[102] 宋濂，〈贈醫師葛子充序〉，《黃溥刻輯補》（收入《宋濂全集》），頁 1984-1985。

[103]「覃懷鄭公持節浙東，尤敬先生，以尊客禮禮之。眾或不樂，競短其行於公。公笑曰：朱聘君盛舉之長，而諸公顧反短之，何其量之懸隔耶？皆慚不能退。」宋濂，〈石表辭〉，頁 2131-2138；黃宗羲，《宋元學案・北山四先生學案》卷八二中朱震亨的傳記題為「聘君朱丹溪先生震亨」。（頁 39a）

[104] 趙元玲指出「儒醫」藉此爭論標榜自身的合法性，強調經過經典文本訓練的「儒醫」優越於父子相傳醫術經驗的「世醫」，以及其他醫學群體，Yuan-ling Chao, *Medicine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A Study of Physicians in Suzhou 1600-1850* (New York: Peter Lang, 2009), pp. 26-44；關於明代儒醫、世醫之爭，請參考邱仲麟，〈綿綿瓜瓞〉，頁 62-63。

[105] 宋濂，〈石表辭〉，頁 2131-2138。

很多人和北方醫者有接觸，或有曾在北方生活的經歷。[106] 終於，一三二五年，作為一個四十四歲、已行醫十多年的醫者，朱震亨找到了醫學之師——杭州羅知悌 (fl. 1325)。羅知悌是南宋寺人，宋亡後以醫為生，傳說他從某僧侶處習得劉完素的真傳。[107] 朱震亨的拜師過程並不順暢，他以程門立雪般的精神去感動羅知悌，三個月以後才得以入門。在羅門下的一年半，觀察老師如何治療病人，是朱震亨最有心得的學習方式，解答了他讀張從正、劉完素之書而產生的疑惑。[108]

朱震亨傳授弟子醫學的方法也不止是讀「三世」書。雖然，在朱震亨的傳記和弟子的回憶中，文本研讀佔據首要位置。譬如弟子劉純 (fl. 1368-1408) 所撰《醫經小學》，朱震亨教學生首先必須讀儒書，其次讀《內經》、《脈經》等經典，之後再讀《傷寒論》以及金元當代醫書。[109] 戴思恭的行狀聲稱，戴游於丹溪門下三十餘年，和朱震亨見面主要是討論「聖賢宏奧」。[110] 可是，從其他角度來看，經典文本並不是全部。比如明清醫學入門書中，劉純的著作並不流行。[111] 並且明代江浙醫者所熱衷傳閱的文本，並非《內經》抑或劉純所撰醫學入門書，而是實用性較強的《丹溪醫案》和《丹溪心法》。此外，僅從丹溪及其弟子傳記、行狀所不能看到的是，朱震亨教醫並不只是句讀醫書，也攜帶弟子一起治療病人，比如浙東判官張某生病，丹溪把脈之後，認為病人「內勞其真，外勞其形」，非專藉藥可療，「因屬其高第弟子賈君思誠留以護治之」。[112] 弟子們也許還在朱震亨所開的藥店工作，從丹溪訓子的〈醫家十要〉可見，朱震亨的藥店中

---

[106] 如葛應雷曾與中州名醫李某討論醫學，嚴壽逸曾在北京遊學。黃溍，〈成全郎江浙官醫提舉葛公墓誌銘〉，李修生，《全元文》第 30 冊，卷九七八，頁 358-360；危素，〈故天臨路醫學教授嚴君墓誌銘〉，李修生，《全元文》第 48 冊，卷一四八一，頁 546-547。

[107] 陳讓、夏時正，《成化杭州府志》（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 175 冊），卷四五，頁 645；戴良，〈丹溪翁傳〉，李修生，《全元文》第 53 冊，卷一六三八，頁 437-445。

[108] 震亨觀察羅的用藥並不像醫書文字一般死板，攻補並用，無一定之方，配藥也多有創新，不依賴成方。他還記載了親觀羅為病僧治療的經過，並稱看完之後才瞭解張子和的「攻擊法」如何運用在不同體質的病人身上。朱震亨，《格致餘論》（收入浙江省中醫藥研究院文獻研究室，《丹溪醫集》），〈張子和攻擊注論〉，頁 32。

[109] Angela K. C. Leung（梁其姿）, “Medical Instruction and Popularization in Ming-Qing China,” *Late Imperial China* 24.1 (2003): 130-152.

[110] 鄭沂，〈明奉政大夫太醫院使顯一府君行狀〉，頁 372-373。

[111] Leung, “Medical Instruction and Popularization in Ming-Qing China,” pp. 130-152.

[112] 宋濂曾記載朱丹溪治浙東判官張某，把脈診治之後，留弟子賈思誠護治。宋濂，〈贈賈思誠序〉，《黃溥刻輯補》（收入《宋濂全集》），頁 1975-1976。

至少雇有郎中、磨作這兩種工徒。[113]

其實與朱震亨同時代的其他士人，也不一定同意宋濂讀「三世」書醫者最優秀的觀點。比如江西李存，將自己失敗的行醫經歷歸咎於儒者出身，雖然跟老師讀過醫經和各家醫書，但仍對醫學「不專」，誤診許多病人：

> 余幼多疾，一嘗從醫師，涉神農、黃帝之書，下及張、陶、孫、許數十家言，欲以稍知疾疢之所由起，金石草木寒熱溫涼之所由用。既而姻友間意余卒業，踵相問，或內顧而難之，則咎余要祕也。一八十媼痰吼上，氣脈急出。余曰：「脈當病，可作蘇子湯一劑。」已，明日死也。一女子脹急不穀，余曰：「此血閉病也，法當以乾漆三稜輩治之。」不可，更醫，則孕氣不和證也。一女子苦濕痞脈肥肥溢指，余曰：「不害，明日作豬苓湯投之。」已，晡時死也。一男子溫熱，上滿下泄，鼻出血，余曰：「在傷寒法，此為陰陽離絕，不治。」更醫乃已。嗚呼！茲事豈易言哉！古之人卜涉獵以為名，不欺虧以取利，幽探於五行之運，著察於風土之宜，然後審別製劑而中。若余者，志學於儒家者也，不專，徒兩失之，今絕口不言醫。[114]

但是，在「儒醫」越來越強勢的歷史潮流中，宋濂的看法壓倒了反對的聲音。朱震亨儒、俠、醫的多重面目及成功的行醫經歷，被簡化歸類為「儒醫」讀「三世」書的高明。與儒有關的特質成為評論醫者能力高下的標準，醫史呈現醫者的方式也變得和道統傳類似。[115] 以堅持共同的丹溪理念為出發點的丹溪學派，也在十五世紀中期以後逐漸形成，相對公開地撰寫、出版以丹溪為名的文本逐漸成為比附丹溪最重要的方式，取代了第二節所呈現的相對秘密地在固定師徒網絡中傳承丹溪知識的方式。

十五世紀中，在太醫院顯赫一時的以戴思恭、趙良仁、王賓為主線的師徒傳承脈絡逐漸模糊消失。於此同時，以丹溪為名的文本生產卻大量出現（參考附錄）。譬如景泰 (1450-1456) 以後湧現多種版本《丹溪心法》。然而這些文本的

---

[113] 劉純，《劉純醫學全書》，〈《雜病治例》自序〉，頁 468。關於明代醫家兼營藥店的記錄，參考童光東、劉惠玲，〈明清時期新安藥店及其醫藥學作用〉，《中華醫史雜誌》25.1 (1995)：30-34。據近代史家觀察，清末中藥店有配藥者，在醫師的監督下負責配藥，多由資深學徒擔當；有飲片切工者，負責加工藥材，大致類似這兩種工徒。陳新謙、張天祿，《中國近代藥學史》（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2），頁 87-90。

[114] 李存，〈贈陳仲達序〉，李修生，《全元文》第 33 冊，卷一〇五九，頁 308-309。

[115] 祝平一，〈宋明之際的醫史與儒醫〉，頁 401-443。

作者是誰，並不能簡單地論斷。首先，朱震亨名下的著作龐大而蕪雜，《中國中醫古籍總目》中署名為丹溪的醫學文本有近二十種；[116] 而據劉時覺搜尋統計文獻目錄，發現此類丹溪醫書有四十四種。[117] 但是，時間上最接近朱震亨的宋濂、戴良記載中，朱震亨的生平醫著僅有五種：

> 先生所著書，有《宋論》一卷，《格致餘論》若干卷，《局方發揮》若干卷，《傷寒論辨》若干卷，《外科精要發揮》若干卷， 《本草衍義補遺》若干卷，《風水問答》若干卷，凡七種，微文奧義，多發前人之所未明。[118]

所以，現今所流傳以及明清目錄所著錄的丹溪著作，絕大部分都是在朱震亨死後才出現。這些著作中，比較早期出現的著作《丹溪醫按》和《丹溪藥要》，據說是戴思恭、趙良仁這兩位入室弟子在丹溪門下的學醫筆記。比如戴思恭「當侍教之日，見先生用藥治病，……從而錄之，名曰《醫按》」。[119] 趙良仁在朱震亨門下，「錄其所見聞之法」，撰成《丹溪藥要》（今佚）。[120] 相對於朱震亨生前所著《格致》、《局方》二作，這兩種醫著比較傾向於實用治療。《丹溪醫按》分門別類地記錄了一些治病醫案，絕少議論醫理。《丹溪藥要》雖亡佚不可見，但從存序可見其側重於用藥之法。此二書一度成為元末明初江南醫者爭睹對象，但可獲閱讀者十分有限，僅限於前節所分析之丹溪的師徒網絡之中。也就是說，元末明初與丹溪有關的文本主要依賴從戴思恭等人一脈相承的相對封閉的人際網絡來傳播。

十五世紀中期以後湧現多種版本《丹溪心法》。書名均冠「丹溪心法」字樣，編排疾病的方式與戴思恭所編《金匱鈎玄》類似，但各個版本的修訂者均不同，社會背景各異，疾病條目下具體內容也有差異。[121] 這些修訂者及其出版者們不再局限於戴思恭、王賓等人的師徒網絡，出版地域也超出江南。景泰《丹溪心法類集》出版於陝西，修訂者是陝西楊珣（生卒年不詳），曾任武功縣醫學訓科。成化《重訂丹溪先生心法》，修訂者為新安程充 (1433-1489)，出版者為程

---

[116] 薛清錄主編，《中國中醫古籍總目》（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7）。

[117] 劉時覺，《丹溪學研究》，頁 82-107。

[118] 宋濂，〈石表辭〉，頁 2131-2138。

[119] 王恆，〈《丹溪醫按》序〉，劉時覺、薛軼燕，《丹溪逸書》，頁 3。

[120] 華悰韡，《慮得集》，〈代題《丹溪藥要》序〉，頁 286。

[121] 《金匱鈎玄》據說成書於元末，未載於宋濂、戴良所撰丹溪傳記墓辭，《明史》載此書為丹溪原著、戴思恭訂正，見張廷玉，《明史》卷二九九，〈戴思恭傳〉，頁 7645。

充族人。程充是一個沒有科舉功名的普通徽州士人，據說精通醫、堪輿、數學，因為婺州人王允達聘其為幕友，而有機會接觸丹溪曾孫家藏醫書。[122]《丹溪先生纂要》的修訂者東陽盧和 (fl. 1484)，因為東陽與義烏接近，明代同屬金華府，所以盧和的伯父有機會蒐集鄉間丹溪遺著，成為盧和著述的基礎，由盧和族姪出版。[123] 總之，這些修訂者和以戴思恭、趙良仁為核心的師徒網絡沒有關係，也沒有自稱是丹溪弟子，接觸丹溪和出版醫書的方式也相對公開。[124]

與丹溪師徒網絡的疏離，也體現在這些《丹溪心法》的修訂編纂原則中。程充在自序中批評了在陝西和四川出現的前兩種《丹溪心法》附雜許多並非丹溪的議論，質疑它們與丹溪本來意義的一致性。但是他修正的方式並不是尋找正宗的丹溪傳人秘授真法，而是用金元醫家李杲、羅天益以及戴思恭、劉純的醫書來校正《心法》：

> 楊之集篇目或有重出而亦有遺附以他論，使玉石不分。王因之附添諸方，多失本旨……竊取《平治薈萃經驗》等方及《玉機微義》、《衛生寶鑑》、《濟生拔萃》東垣河間諸書校之，究尾會首，因證求方，積日既久，復得今中書烏傷王允達先生以丹溪曾孫朱賢家藏的本寄示，合而參考，其或文理乖訛，意不相貫者，詳求原論，以正其誤。[125]

程充相信朱震亨和金元醫家思想的連貫性，認為其表現於文本中。所以，他並沒有像朱震亨一樣旅行各處尋找正宗傳人的指教，也不像王賓一樣從丹溪弟子處偷覽朱震亨醫案，而是直接找來劉完素、李杲等金元醫著以及早期丹溪弟子戴思恭、劉純的醫著來校正陝、蜀《丹溪心法》的「謬誤」。盧和甚至批評戴思恭《金匱鈎玄》過於「率略」，「且有雜以他說、己意者」，進一步質疑從單一丹溪弟子秘傳接近真正丹溪思想的可能性。[126] 十六世紀方廣修訂《丹溪心法》，甚至將同時代自稱丹溪弟子的王綸 (1453-1510) 也列入參校文本之列。[127] 在這三位

---

[122] 程敏政，《篁墩文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第 1252-1253 冊），卷四五，〈程用光墓誌銘〉，頁 90-91。

[123] 盧和，《丹溪先生纂要》（嘉靖二十六年〔1547〕盧堯亮刊本，北京：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丹溪先生纂要》自序〉，頁 5a。

[124] 事實上，此時即使自稱丹溪弟子的王綸和虞摶，也沒有史料證據說明他們和元末明初的丹溪弟子群體有關係，劉時覺將二人歸入「私淑弟子」，《丹溪學研究》，頁 59-60。

[125] 程充，〈丹溪先生心法序〉，浙江省中醫藥研究院文獻研究室，《丹溪醫集》，頁 137。

[126] 盧和，《丹溪先生纂要》，〈《丹溪先生纂要》自序〉，頁 5a。

[127] 方廣，《丹溪心法附餘》（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 44 冊，據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八年〔1600〕刻本影印），〈立書本旨〉，頁 4。

作者中，程充的作品最受歡迎，明代著名的刻書家吳勉學（生卒年不詳）在出版《古今醫統正脈全書》之時選擇收入程充的《丹溪心法》，後來南京、建陽的商業書坊均選擇重刊刻此版本。[128]

總而言之，《丹溪心法》修訂者們似乎不迷信某個丹溪入室弟子的文本，同時也不排斥當代醫者對丹溪文本的新闡釋。總體修訂原則就是從他們所認為的與朱震亨醫學思想有關聯的文本中折衷歸納屬於「丹溪」的知識。這種透過相關文本之間的「互文」參校來呈現真正丹溪思想的努力，無論是否達到還原真實朱丹溪的初衷，實質上都在文本中確立了從劉完素到朱震亨醫學傳承的知識系譜。一個堅持共同醫學理念的學派，就在這種「互文」風格的文本撰寫中呈現出來。[129]

因此，在醫書撰寫中，比起直接在朱震亨門下就學的弟子，十六世紀的醫者似乎更加了解丹溪的醫學宗旨。譬如後者更加頻繁地引用丹溪，以及極力釐清丹溪的思想。樓英《醫學綱目》廣徵博引歷代醫家，並不限定以朱震亨為唯一標準，甚至有些章節完全沒有提及丹溪。[130] 然而，虞摶 (fl. 1438-1515)《醫學正傳》卻幾乎在討論每一疾病門類的開始都要徵引丹溪的病因分析和治法。王綸《明醫雜著》更宣稱已成功地將朱震亨「陽有餘而陰不足」論述應用至治療實踐中。他總結丹溪治病原則就是針對「氣、血、痰」，並宣稱以單一「補陰丸」治丹溪所論之「陰虛」。[131] 距離朱震亨時代較近的丹溪弟子，反而沒有人提出像王綸這麼過於簡單化的丹溪思想總結。總而言之，這種整合從劉完素到朱震亨的金元醫學知識體系的努力，在十五世紀中期以後達到尖峰，表現為大量依附丹溪的文本編纂和出版。此時，宣稱自己是丹溪傳人的方式，並不是比附蘇州城和明初太醫院的醫者網絡，而是轉化為從文本考訂真正的丹溪醫學思想，由此在歷史中呈現了一個丹溪學派的面貌。

---

[128] 賈晉珠 (Lucille Chia) 著，湯芸譯，〈吳勉學和明朝的刻書世界〉，米蓋拉、朱萬曙編，《法國漢學（第十三輯）》（北京：中華書局，2008），頁 20-49。

[129] Fabien Simonis 在對丹溪學派「癲狂」的考察中指出，明代許多作者採取「折衷」多種文本的策略生產出「丹溪文庫」，《丹溪心法》的出現是丹溪學派形成的里程碑，詳見 Simonis, “Mad Acts, Mad Speech, and Mad People in Late Imperial Chinese Law and Medicine,” pp. 165-201.

[130] 比如討論「癲狂」一症中樓英並不曾引用丹溪，參考 Simonis, “Mad Acts, Mad Speech, and Mad People in Late Imperial Chinese Law and Medicine,” pp. 143-150.

[131] 王綸著，薛己補注，《明醫雜著補注》（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5），卷一，頁 2-4。

四・結論

從清代《四庫全書》編纂者至現代醫學史學界，對「丹溪學派」、「金元四大家」的論述不可枚舉。本文試圖在龐大浩瀚的前人研究基礎上，利用地方志、族譜和文人贈序等資料，從社會史的角度考察朱震亨及「丹溪學派」中的相關醫學人物。本文目的並非否認朱震亨在醫學史中的地位，而是致力將朱震亨置入歷史和地方社會語境，呈現元明之間江南地方社會中，一個擁有俠、儒、醫多面形象的朱震亨上升為明清後世儒醫偶像和學派始祖的歷史過程。這個超過兩個世紀的歷史建構過程，是幾代醫者群體性的努力。

在同時代史家宋濂的筆下，朱震亨的個人歷史經過了由俠而儒的轉化過程。他早年「尚俠」，後在婺州朱熹正統理學的熏陶下轉向「求道」之路：一方面表現為致力探索醫學，另一方面則積極主導建立家族祠堂以及確立祭祖禮儀，其社會影響力遠超一般醫者甚至儒者。從主導地方經濟、文化事務的角度，朱震亨的事例體現了南宋以後地方居鄉士人共通的氣質。然而朱震亨在元代婺州特定的理學傳統中的熏陶，使其作為儒醫的形象更易為明代以後的主流社會所接受。

至元末明初，朱震亨的弟子們形成了從婺州、蘇州到明朝太醫院的世代師徒網絡，共同尊奉丹溪為老師，對丹溪有非常高的忠誠度，在內部傳遞與丹溪有關的醫學文本。可是，這些醫者雖然宣稱授受傳承丹溪的知識，但卻沒有形成牢固的學術共同體，也沒有提出一致的醫學理念原則。聲稱認同同一醫學理念的學派面貌，只是表現在十五世紀中期以後，以釐清「真正」的丹溪知識及金元醫學系譜為目標的文本生產。不斷在商業書坊湧現的《丹溪心法》，其不同版本的編纂者，往往堅信從劉完素至朱震亨在醫學觀念和原則上的一致性，並將他們所認為相關的金元文本，用來參校、還原「真正」的《丹溪心法》。此種努力不僅改變了封閉式傳授知識的丹溪師徒群體的性質，而且在文本中建立了一定的知識系譜，形成了後世所認為的丹溪學派的面貌。

（本文於民國一〇三年十一月三日收稿；一〇四年四月二十三日通過刊登）

後記

此文係本人在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攻讀博士及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做博士後研究期間的部分成果，非常感謝一直以來梁其姿老師的悉心指導與鼓勵。祝平一老師對初稿修改的點撥是此文成形的關鍵，同時感謝我在近史所的同事黃麗安對文字的潤色，以及承蒙張哲嘉、張瑞威等教授和兩位匿名審查人的指正，在此一併致謝。

附錄

十五世紀中至十六世紀末出版之《丹溪心法》[132]

書名	作者	成書年代	刊刻年代	作者籍貫	出版地點	出版者
丹溪心法類集	楊珣	景泰 (1450-1456)	景泰 (1450-1456)	陝西	陝西	不詳
丹溪心法類集	王季瓛	成化 (1465-1487)	成化 (1465-1487)	西蜀	西蜀	不詳
丹溪心法	不詳	十五世紀中後期	十五世紀中後期	不詳	福建	不詳
重訂丹溪先生心法	程充	成化十八年 (1482)	弘治 (1489-1505)	新安	新安	程祖興
丹溪先生纂要	盧和	成化二十年 (1484)	嘉靖二十六年 (1547)	東陽	東陽	盧堯亮
丹溪心法附餘	方廣	嘉靖十五年 (1536)	嘉靖十五年 (1536)	休寧	臨潁	禮部尚書賈詠
丹溪先生治法心要	趙應春	嘉靖年間 (1522-1566)	嘉靖年間 (1522-1566)	江陰	南京	趙文育
丹溪手鏡	方處善	洪武三年 (1370)	天啟元年 (1621)	義烏	義烏	丁承祖、吳尚默
丹溪摠錄	不詳	萬曆十四年 (1586)	清代抄本	不詳	不詳	不詳

[132] 前三種《心法》原本已佚，據程充，〈丹溪先生心法序〉，頁 137；程充，《重訂丹溪先生心法》（弘治〔1489-1505〕新安程祖興等刻本，北京：中國中醫科學院圖書館藏）；盧和，《丹溪先生纂要》；方廣，《丹溪心法附餘》；趙應春，《丹溪先生治法心要》（北京：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方處善，《丹溪手鏡》（天啟元年〔1621〕丁承祖、吳尚默刻本，北京：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不著撰人，《丹溪摠錄》（清代抄本，北京：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赤岸朱氏家乘》，清代年份不詳木活字本，上海：上海圖書館藏。
《赤岸朱氏宗譜》，嘉慶十九年 (1814) 木活字本，上海：上海圖書館藏。
不著撰人，《丹溪揔錄》，清代抄本，北京：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方孝孺，《遜志齋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集部第 323-325 冊。
方處善，《丹溪手鏡》，天啟元年 (1621) 丁承祖、吳尚默刻本，北京：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方廣，《丹溪心法附餘》，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 44 冊，據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八年 (1600) 刻本影印。
王世貞，《弇山堂別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5，據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本影印。
王行，《半軒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香港：迪志文化出版公司，2002，第 1231 冊。
王綸著，薛己補注，《明醫雜著補注》，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5。
王賓，《光庵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出版公司，1995-1997，集部第 28 冊，據北京大學藏清抄本影印。
王彝，《王常宗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第 1229 冊。
王鏊，《守溪筆記》，收入《紀錄彙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9，第 39 冊。
王鏊，《姑蘇志》，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上海：上海古籍書店，1990，第 11-14 冊。
永瑢等著，紀昀總纂，《欽定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藝文印書館，1964。
宋濂，《宋濂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
宋濂等，《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
李修生主編，《全元文》，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
周士英纂修，崇禎《義烏縣志》，收入《稀見中國地方誌彙刊》，北京：中國書店，1992，第 17 冊，據明崇禎年間刻本影印。
倪謙，《倪文僖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第 1245 冊。
徐有貞，《武功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第 1245 冊。
浙江省中醫藥研究院文獻研究室編校，《丹溪醫集》，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3。

張廷玉，《明史》，收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新漢籍電子資料庫」，清武英殿本底本。
陳文等，《明英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
陳夢雷編，《古今圖書集成醫部全錄》，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59。
陳讓、夏時正，《成化杭州府志》，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 175 冊。
焦竑，《國朝獻徵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第 525-531 冊，據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四年 (1616) 徐象標曼山館刻本影印。
程充，《重訂丹溪先生心法》，弘治 (1489-1505) 新安程祖興等刻本，北京：中國中醫科學院圖書館藏。
程敏政，《篁墩文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第 1252-1253 冊。
程瑜、諸自穀修纂，嘉慶《義烏縣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浙江府縣誌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3，第 53 冊，據嘉慶七年 (1802) 刻本影印。
華悰韡，《慮得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1122 冊，據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嘉靖十一年 (1532) 華從智刻本影印。
黃宗羲著，全祖望續修，王梓材校補，《宋元學案》，收入《四部備要》，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5，子部第 149 冊，據清道光道州何氏刻本校刊。
楊士奇，《明太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
楊士奇，《東里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第 1238-1239 冊。
楊循吉，《蘇談》，收入《紀錄彙編》第 69 冊。
趙應春，《丹溪先生治法心要》，嘉靖三十八年 (1559) 江陰趙應春刻本，北京：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劉時覺、薛軼燕編校，《丹溪逸書》，上海：上海中醫藥大學出版社，2005。
劉純著，姜典華主編，《劉純醫學全書》，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9。
鄭沂，〈明奉政大夫太醫院使顯一府君行狀〉，方春陽編著，《中國歷代名醫碑傳集》，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9。
盧和，《丹溪先生纂要》，嘉靖二十六年 (1547) 盧堯亮刊本，北京：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韓慧基修，雍正《義烏縣志》，雍正五年 (1727) 刻本，上海：上海圖書館藏。
顧清，《東江家藏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第 1261 冊。

二・近人論著

丁光迪
1999　《金元醫學評析》，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

王鴻泰
2014 〈武功、武學、武藝、武俠：明代士人的習武風尚與異類交游〉，《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5.2：209-267。
吳以義
1992 〈溪河溯源：醫學知識在劉完素、朱震亨門人間的傳遞〉，《新史學》3.4：57-94。
余英時
2004 《朱熹的歷史世界》，北京：三聯書店。
何淑宜
2009 《香火：江南士人與元明時期祭祖傳統的建構》，臺北：稻鄉出版社。
李聰甫、劉炳凡編
1983 《金元四大醫家學術思想之研究》，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
邱仲麟
2003 〈綿綿瓜瓞——關於明代江蘇世醫的初步考察〉，《中國史學》13：45-67。
姚大力
2011 〈元朝科舉制度的行廢及其背景〉，氏著，《蒙元制度與政治文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科大衛
2003 〈祠堂與家廟——從宋末到明中葉宗族禮儀的演變〉，《歷史人類學學報》1.2：1-20。
祝平一
2006 〈宋明之際的醫史與儒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7.3：401-443。
范行準
1986 《中國醫學史略》，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
孫克寬
1975 《元代金華學述》，臺中：私立東海大學。
馬堪溫
2007 〈中國古代名醫故里古跡調查〉，王淑民、羅維前主編，《形象中醫：中醫歷史圖像研究》，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頁 244-261。
陳元朋
1997 《兩宋的「尚醫士人」與「儒醫」——兼論其在金元的流變》，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

陳雯怡
2009 〈「吾婺文獻之懿」——元代一個鄉里傳統的建構及其意義〉，《新史學》20.2：43-114。
陳新謙、張天祿
1992 《中國近代藥學史》，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
梁其姿
2012 《面對疾病：傳統中國社會的醫療觀念與組織》，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梁庚堯
1993 〈豪橫與長者：南宋官戶與士人居鄉的兩種形象〉，《新史學》4.4：45-95。
童光東、劉惠玲
1995 〈明清時期新安藥店及其醫藥學作用〉，《中華醫史雜誌》25.1：30-34。
華犁
1981 〈朱丹溪家鄉調查記〉，《浙江中醫藥大學學報》1981.6：30-32。
黃清連
1978 〈元初江南的叛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49.1：37-76。
賈晉珠 (Lucille Chia) 著，湯芸譯
2008 〈吳勉學和明朝的刻書世界〉，米蓋拉、朱萬曙編，《法國漢學（第十三輯）》，北京：中華書局，頁 20-49。
劉時覺
2004 《丹溪學研究》，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
蕭啓慶
2008 〈元朝科舉與江南士大夫之延續〉，氏著，《元代的族群文化與科舉》，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薛清錄主編
2007 《中國中醫古籍總目》，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
Bol, Peter
2001 "The Rise of Local History: History, Geography, and Culture in Southern Song and Yuan Wuzhou."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1.1：37-76.
2003 "Neo-Confucianism and Local Society, Twelfth to Sixteenth Century: A Case Study." In *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 edited by Paul Smith and Richard von Glah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pp. 241-283.

Chao, Yuan-ling（趙元玲）

2009 *Medicine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A Study of Physicians in Suzhou 1600-1850*. New York: Peter Lang.

Ebrey, Patricia

2003 "The Early Stag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Descent Group Organization." In *Women and the Family in Chinese History*, edited by Patricia Ebre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Faure, David（科大衛）

2007 *Emperor and Ancestor: State and Lineage in South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Furth, Charlotte（費俠莉）

2006 "The Physician as Philosopher of the Way: Zhu Zhenheng (1282-1358)."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6.2: 423-459.

Hanson, Marta

2011 *Speaking of Epidemics in Chinese Medicine: Disease and the Geographic Imagin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Leung, Angela K. C.（梁其姿）

2003 "Medical Instruction and Popularization in Ming-Qing China." *Late Imperial China* 24.1: 130-152.

Scheid, Volker

2007 *Currents of Tradition in Chinese Medicine: 1626-2006*. Seattle: Eastland Press.

Shinno, Reiko

2007 "Medical Schools and the Temples of the Three Progenitors in Yuan China: A Case of Cross-Culture Interactions."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7.1: 89-133.

Simonis, Fabien

2010 "Mad Acts, Mad Speech, and Mad People in Late Imperial Chinese Law and Medicine." PhD diss., Princeton University.

From Zhu Zhenheng to the Danxi School: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onfucian Physician and Medical Scho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

Xueqian Zhang

Hong Kong Institute for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his paper addresses the most prominent late imperial Chinese "Confucian physician", Zhu Zhenheng (1281-1358), from a social history perspective, investigating how a local physician in Southern China arose to be a nationally acknowledged authority on medicine between the thirteenth and sixteenth centuries. Although Zhu and his "Danxi" school had been intensively explored by previous scholarship, this paper's contribution lies in its meticulous reconstruction of the forming of "Danxi" mastership in scholarly medicine as a century-long historical process situated in changing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text of local Jiangnan (Yangzi Delta) region. Firstly, it unveils Zhu's image as a powerful social and cultural authority in his hometown Wuzhou, by highlighting his leading participation in ancestral sacrifice activities of local families under the surname of "Zhu", in tax revenue collection and judicial negotiation with local government, and in other "public" affairs. Secondly, it traces the expansion of this network of physicians, who identified themselves as Zhu's medical disciples, from local Yangzi Delta to the Imperial Medical Bureau of the newly established Ming power. This evolving network, enhanced by the "master-disciple" connection, facilitated the social foundation of Danxi's rise as the national master on medicine. Thirdly, it argues after the mid-fifteenth century, the idea of being a disciple of the Danxi school shifted from making personal connection with Zhu's medical descendants to interpreting Zhu's idea through textual production, which focused on a certain public and scholarly debate on "authentic" principle of "Danxi". Enhanced by a flourishing commercial publishing industry from the late fifteenth century onward, this new scholarly style of textual production finally consolidated the "Danxi" school in late imperial Chinese medical tradition.

Keywords: social history, the Danxi school, Confucian physician, textual knowledge